

意識形態與中國居民的環保態度*

徐 生 權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

摘要

大量文獻證明意識形態的分歧會對人們的環保態度產生顯著影響，美國的「左／自由派」人士有著更加積極的環保態度。但是很少有人去討論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在中國又是如何。由於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的意識形態「左—右」的分野與美國有著重大差異，這也給意識形態對環保態度影響的探究帶來了複雜性。利用 CGSS2010 的數據，本研究發現，意識形態「左—右」的分野的確會對中國居民的環保行為產生影響。不過，由於中國的「威權環保主義」策略，意識形態「左—右」的對立並沒有成為影響人們環保態度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分歧，反而是「威權主義—自由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區分成為中國居民的環保態度的顯著預測因素，即「自由主義」的立場越強，包括環保支出意願、環保行為在內的整個環保態度越消極。但這種消極態度可能更多是對「威權環保主義」治理策略的質疑，相對的，在保護環境、節約資源成為中國基本國策的背景之下，偏向「威權主義」的人表現出了相對積極的環保態度。本研究也說明了，意識形態對環保態度的影響在不同政體的國家有著不同的作用機制。

關鍵詞：意識形態、環保態度、中國、環境政治

* * *

壹、前言

意識形態傾向素來被認為是影響環保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Liere and Dunlap

* 感謝《中國大陸研究》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惟本文中的諸多缺失之處仍由作者本人負責。

1980），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大量的研究成果都證明了意識形態傾向與美國人的環保態度之間有著穩固的內在聯繫，一般而言，美國意識形態偏左或者自由派人士（liberals）有著較強的環境關心，對環保事務也更加積極，而意識形態偏右或者保守派人士（conservatives）則是相反（Buttel and Flinn 1978；Dunlap 1975, Dunlap, Xiao, and McCright 2001；McCright and Dunlap 2011）。一個現實例證就是，美國總統川普在上任之前就公開宣稱全球變暖是一個中國編造的騙局（hoax）（The Guardian 2016），實際上在保守偏右的美國共和黨內部，全球變暖是個謊言此種言論一直頗有市場，此種政治基礎也直接導致了川普在 2017 年 6 月 1 日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拒絕美國再為抗擊全球變暖而買單。

隨著環境問題變成一個全球性的事務，越來的越多的研究者（Fairbrother 2016；McCright, Dunlap, and Marquart-Pyatt 2016；Nawrotzki 2012）也開始追問「越左越環保」這一結論是否具有普適性，即美國式特有的環保政治解釋能否也能恰當地應用到其他國家的環境政治理解中。McCright、Dunlap 和 Marquart-Pyatt（2016）等人通過對歐盟 25 個國家的研究發現，自認為是左派立場的居民依然要比那些自認為右派立場的居民更加相信氣候變遷的發生，以及有著更加強烈的採取行動的意願。但是有點出乎意料的是，以上的結論僅適用於 14 個西歐國家。在東歐的 11 個前共產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對此議題的影響並不顯著。研究者們認為，這或許是因為氣候變遷這一議題在這些國家並沒被明顯地「政治操作化」，另外，由於在調查中，意識形態的「左」和「右」測量是基於受訪者的自我評估，但是，前共產主義國家居民對於什麼是意識形態的「左」和「右」的理解上或許並沒有西歐國家來的一致，這也是可能導致這一結果不顯著的原因。

Nawrotzki（2012）也對美國結論的普適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保守派人士反對環境保護這一結論是否成立要取決於國家的特性，比如經濟發展水平、環境狀況以及是否有過共產主義政體的歷史。利用國際調查項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以下簡稱：ISSP）2000 年的數據，Nawrotzki 對分布在亞、歐、美洲 19 個政治制度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各異的國家的環境政治議題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在已開發的、資本主義的以及環境狀況相對優越的國家，就越能觀察到保守派人士反對環保的現象；而與之相反，在開發中、以及環境狀況惡劣的國家中，自由派人士則對環境保護愈加冷漠。

這也說明了，意識形態傾向對於環保態度的影響是一個因國家特性而異的話題。從根本上來說，討論意識形態與環保態度之間的關係更多的是一種西方式的視角，這種考察是跟西方的選舉制度有關的，通常西方社會都有著明顯的意識形態分

野和政黨對立。意識形態作為一種信念體系，在經年累月的政治化運作中，不同的意識形態傾向已經與特定的政黨或政治力量結盟，進而對諸如環保、稅收、醫保、槍支管理、移民等社會事務的態度產生影響。可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東亞地區，比如中國大陸，一個新的問題也就出現了，那就是意識形態對於中國居民的環保態度影響是怎麼樣的？如果中國也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分野，並且也對中國居民的環保態度產生了影響，那麼這種影響的作用機制與西方的一致嗎？還是說，我們必須給出一種基於中國特殊國情的理解和回應？

此前，很少有文獻去探討這一話題。原因可能在於意識形態的分野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公眾話題，可能對於一個普通的中國居民而言，理解「左—右」的意涵似乎都是比較吃力的，但這並不代表中國社會中沒有意識形態的分野，並且中國意識形態的分野可能要比西方的「左—右」二分更加複雜。另外中國採取的是一種「威權環保主義」（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的策略（簡旭伸 2016；Gilley 2012），這是一種在政策制定時非公眾參與式的取徑，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成為環境政策的主要輸出者，因而，對中國環境政治關注的焦點往往都會落在執政黨的環境政策輸出上而缺乏對於民眾參與的討論。

雖然如此，我們依然需要弄清意識形態與中國居民的環保態度之間的關係，畢竟，無論政府有著什麼樣的政策產出，執行者依然是廣大的百姓。實際上，中國式的「威權環保主義」策略在短時間之內確實對中國的環境保護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其爭議的聲音也是一直不斷，環境抗爭事件時有發生。隨著中國市民社會和綠色公共領域的崛起（Yang and Calhoun 2007），未來將有著更多的中國居民關心和從事環境保護，意識形態作為一種信念體系，也會促使居民的環保行為發生改變。那麼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也將變得有意義，它至少能夠回答意識形態對於中國居民的環保態度有無影響，以及如何影響，瞭解這些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去理解中國居民的環保行為，去促成一個環保型社會的儘快到來。

貳、文獻回顧

一、意識形態對環保態度的影響

意識形態的定義及其應用十分廣泛。總得來說，意識形態是一套關於「社會秩序應當如何以及怎樣達到」的信念體系（Erikson and Tedin 2014, 70）。在學術

研究中，政治意識形態通常被視為是一個雙極結構，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分別占據這一結構的左右兩級（Federico 2007）。Jost、Federico 和 Napier（2009）認為，人們視自己是意識形態左傾還是右傾要取決於相互聯繫的兩個方面：擁護還是抵制社會變革（或社會傳統）；拒絕還是接受社會的不平等。一般而言，左派或者自由派擁護社會變革，拒絕接受社會不平等；而右派或者保守派則是較為擁護傳統，接受社會的不平等。

對於社會生活而言，意識形態涉及到其中諸多方面。Jost、Federico 和 Napier（2009）指出，不同的意識形態能夠讓其追隨者產生不同的社會風格和認知取向。而環保議題是一個關於社會資源分配、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質量的事務，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要在其中起作用。Dunlap（1975）認為，環境關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入政治領域，各種利益團體在此為自己的利益爭鬥，最終尋求的還是對自己有利的政策改變方向。這也是為何意識形態對環保態度來說起著重要作用的原因。不過，Jagers、Harring 和 Matti（2018）也指出，雖然有著大量的文獻支撐著意識形態對於環保態度起作用的結論，但是過去的研究對於意識形態何以起作用的相關機制卻言之甚少。

過去的學者們通常傾向於通過對於「左傾 / 自由派—右傾 / 保守派」的意識形態的內在分歧來解釋這一作用機制（Buttel and Flinn 1978；Dunlap 1975）。舉例來說，Dunlap（1975）認為，雖然環境汙染橫跨各種意識形態，就是說，不管你是「左派」還是「右派」，實際上大家都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但是，一提到解決環境汙染的舉措，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就顯現了。第一，因為環保需要大量的經費來源，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這個會遭到較多排放汙染的工商業界的反對；第二，環保會引起政府權力的擴張，形成對於私營企業運營的掌控；第三，環保通常會有更加激烈與革新性的行動（包括對於「環境倫理」的主張），這與此前漸進式的改良取徑相違背了。這幾個方面構成了支持或反對環境保護的基礎，對這幾個方面看法的不同實際上也構成了意識形態的差異。由於保守派一貫的親商業立場，他們要比自由黨人更加地反對「大政府」，而後兩個面向的分歧可能是「自由—保守」這一意識形態光譜的重要區隔所在。

類似的，Buttel 和 Flinn（1978）也指出，環境事務並不具有與政黨支持或者意識形態無涉的屬性，環境友善行為最終可能會招致美國右派勢力的反對。這是因為環保的參與式策略（比如推廣使用可回收的瓶子或者使用無鉛汽油）的效果都不是太好，這讓許多人都意識到達到環境保清潔的唯一可能模式就是政府採取強制手段去約束私人行為（比如立法強迫工業企業減少汙水排放），這顯然又會觸動美國

右派的神經。當討論到政策制定，右派屬性的美國共和黨人一向堅持的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立場，自然會反對以環保之名對市場進行干預，而與此相反，左派屬性更多的美國民主黨人則是時常呼籲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加強對於私營企業的監管，所以環境保護在美國也是一個因政黨支持而異的話題。換而言之，環境事務在美國始終是一個與意識形態和政黨支持捆綁在一起的議題(Dunlap, Xiao, and McCright 2001)。在澳大利亞亦是如此，Fielding 等人(2012)的研究發現，政黨認同和意識形態對於政治人物的氣候變遷的信念有著強有力的影響。來自中間偏左的澳大利亞工黨以及激進綠黨的政治人物比起右派領導人來說，對氣候變遷的科學共識更加深信不疑，而意識形態的「左—右」二分則是預測氣候變遷信念的最重要因素。

不過雖然大家都相信意識形態會對環保態度有影響，但是也有些反對聲音認為，從意識形態的內在屬性出發，保守主義在哲學源頭上也是支持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Nawrotzki 2012)，所謂保守主義者反對環境保護只是一個「歷史偶然事件」(historical accident)，因為從表面上來看，環境保護並不是非要與特定的政治態度結合在一起。Nawrotzki(2012)認為，保守主義中蘊含著對於傳統價值的維護，他們將傳統視為維持社會穩定的不二法門，他們拒斥物質主義，並且認為道德價值高於物質價值，因此他們會更加願意犧牲經濟發展來保持環境質量。同樣的，他們恭敬自然，認為人並非萬物的主人而是守護者。最後，他們將自然視為是傳給下一代的珍貴遺產。這些都說明，保守主義者並非天生反對環境保護的，甚至他們有著更大的潛在動力去保護環境，這也是Pilbeam(2003)所說的「綠色保守主義」(green conservatism)。Pilbeam認為，保守主義者並不是單純地無視或者忽略環境事務，只是在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上，保守主義者更想追求的是一種「自由市場環境主義」。實際上環保事務紛繁複雜，包括氣候變遷、水污染、土壤污染、自然資源保護等諸多議題，只要解決辦法不涉及到嚴格的環保政策管制，美國的保守主義者或者右派也並非就是反對環保的。

這也意味著，在同一意識形態內部對於環保態度實際上也是存有分歧的。意識形態與環保態度發生關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後天政治操作化的後果。正如Nawrotzki(2012)所說的，環境保護並非一定要跟某種政治態度結合在一起，但是經年累月的政治運作加劇了這種態度分化。McCright和Dunlap(2011)指出，氣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有一個明顯地被政治化的過程，並且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政黨支持與意識形態在對待這一議題上態度開始持續地兩級分化，也就是說，自由派/民主黨與保守派/共和黨在這一議題上的態度鴻溝日漸加深。而政黨活動進一

步加深了這種態度分化。這種原本只在政治精英層面的態度分化也日益擴及到普通公眾之間。McCright 和 Dunlap (2011) 認為，面對紛繁複雜的外部世界，人們傾向於有選擇性地相信他們所支持的政黨領袖的意見，這種政治取向會讓他們接觸到更多與此相關的信息。一個例證就是，自由派 / 民主黨與保守派 / 共和黨在媒介接觸上是有著顯著差異的。

所以一旦脫離這種多黨競爭制的政治環境，或者，環境議題沒有被政治持續操弄的話，人們的意識形態對於環保態度的影響或許就沒有之前研究所反映的那樣一致和穩固了。Harring 和 Sohlberg (2017) 就指出，媒體、政客以及其他行動力量都在渲染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是不可兼容的，這無形之中會把環境議題變成一個左派議題。相反，如果在公眾之間沒有這樣非此即彼的爭論的話，他們對於意識形態是一個「左—右」議題的認知就不會那麼顯著。他們通過實驗法證明，在環保議題被意識形態「左—右」化了之後，意識形態對於環保態度的影響才會顯現出來。同樣的，Fairbrother (2016) 指出，環境保護在某些國家是個「左—右」議題，但是在大多數國家並不是，我們太高估意識形態的作用是因為對美國的研究結論做了並不合理的外推。事實上，Fankhauser、Gennaioli 和 Collins (2015) 等人的研究發現，只有在「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 國家裡，左翼政府才會比右翼政黨更加使用立法手段來應對氣候變遷。

當然，以上這些解釋意識形態為何起作用的機制實際上都聚焦在人們是如何看待政治以何種方式來干預環保事務的。也有一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意識形態與環境友善行為之間的關係 (Sherman et al. 2016)，他們認為意識形態與環境友善行為之間的關係是受動機所中介的。自由派的人有著較強的自主性，個性更為開放，他們認為環保行為是對自己 and 社會有益的，因而受到更多的自發的內在動機所驅動，而保守派的人則沒有那麼多的內在動力，以不變應變，這也是 Eckhardt (1991) 所指出的，政治上的保守主義通常反對變革，遵守現有的社會規範，並且對於不確定性無法忍受。並且自由派人士喜歡將環保問題視為是一個道德問題，環保論述也變成了「害」(harm) 與「利」(care) 的道德論述，而保守派人士並不喜歡這樣 (Feinberg and Willer 2013)，所以一個有趣的發現就是，當燈泡上印有環保資訊時，保守派人士會表現多更多的拒買意願 (Gromet, Kunreuther, and Larrick 2013)。

簡而言之，雖然環境惡化或者氣候變遷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但是意識形態的傾向卻讓人們在面臨環境決策時產生分歧，儘管這種作用機制欲產生效果是受一定條件限制的。當然，心理學上的解釋似乎更加傾向於支持左傾 / 自由派人士比

起右傾／保守派人士更加環保這一結論具有普適性。這也促使我們更加好奇意識形態在中國對於環保態度的影響會是怎樣，韓國學者 Seoyong Kim 和 Sungwook Kim (2010) 比較了中日韓三國民眾的環保態度，在眾多的自變量中，他們發現意識形態（左—右）對中國居民的環境關心和環保行為沒有影響。他們研究的局限可能在於，意識形態的測量在該研究中採取的是一種自我評估，即受訪者自己填寫意識形態「左—右」的傾向，但是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之下，這樣測量的潛在問題就是，中國的意識形態「左」與「右」有著其特殊含義，甚至在有些議題上，自我評估為中國「左」派的人卻與美國的「右」派無異，所以我們需要對中國的特殊國情進行更加全面性的理解。

二、中國的意識形態分野

意識形態在中國通常是與政治統治聯繫在一起的（Brown 2012），官方視對意識形態的爭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並且持續地加大投入進行本土意識形態的培育，以反對西方意識形態對於中國的侵蝕。一度時間裡，在中國，「右傾」指的是投向敵對陣營——西方資本主義的懷抱，所以將一個人貼上「左」和「右」的標籤所引發的後果可能是殘酷的政治鬥爭，比如在「文革」期間，一個人被劃為「右派」的話，其後果往往是悲劇性的。所以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居民可能會更有策略性使用「左」和「右」的標籤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Nathan and Shi 1996）。

今日，當我們將意識形態作為一個相對中立的學術詞彙進行使用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在中國的語境之下，由於一黨執政下對意識形態所做的「敵我」二分，中國居民對於美國的「自由派—保守派」的意識形態光譜是相對陌生的。即使是「左—右」二分的政治意識形態光譜，在中國，也可能面臨著正好相反的局面，即在某些情況下，美國的「左」可能恰好是中國的「右」（Lau 1999；Li 2017；Wu 2014）。

在西方，尤其是美國，通常來說，「左」意味著同情社會底層和邊緣族群，提倡社會變革以促進平等，因而更加偏好一個「大政府」來重新分配社會資源；而「右」則是重視傳統形成的秩序，反對政府干預，尋求的是一個「小政府」（Jost, Federico, and Napier 2009；Nathan and Shi 1996），但是在中國，「左」與「右」的定位通常是以政府的意識形態立場為參照系的，因為中國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大政府」，事無鉅細地干預到國家運行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在中國支持政府理

念者通常為「左」，反對政府理念者為「右」。所以在中國，「右」派總體上是一個改革者，並不保守，這一點上與美國的「右／保守派」正好相反，中國的「右」派反對現行體制，希望政府能夠更加奉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但是，在政府是否應當干預自由市場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方面，中國的「右」派與美國的「右」派的立場是一致的，即總體上來說，中國的「左」派更加傾向於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強有力干預，並且認為國企應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而中國的「右」派則是提倡市場經濟，注重私營經濟的重要性。簡而言之，在中國，「保守」與「死硬」（hard-line）是通常和「左」聯繫在一起的，而「自由」與「改革」通常是和「右」聯繫在一起的（Lau 1999）。

並且，馬德勇與王麗娜（2015）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左」「右」派網民與西方國家的「左」「右」派在基礎性政治性心理特徵上恰好相反，中國的「左」派相較於「右」派而言，有著更強的威權人格特徵，也更傾向於維持現有的社會秩序和傳統價值，在對外態度上更加強硬。而中國的「右」派比「左」派更關注社會公平、限制公權力和贊同後現代價值（如贊同同性戀婚姻等）。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外國學者會困惑於中國的「左」派通常與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而「右」派對人權議題頗為關注的（Li 2017）。同樣的，Pan 和 Xu（2018）也指出，在中國，那些偏向威權統治的人，更加支持民族主義，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傳統的社會價值觀；而偏好民主政體的人，則不那麼支持民族主義和傳統價值觀，但是更加支持市場化改革。

這充分說明了中國意識形態光譜的複雜性。甚至一個人在經濟上是改革的，主張自由市場，呼籲國家放鬆對於經濟的管控，但是在政治上，他又依然贊成和維護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因為後者在中國是不可動搖的底線。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經濟上，他贊成市場經濟，但是在政治上，他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包括：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Lau 1999；Nathan and Shi 1996）。也就是說，基於中國的特殊國情，何謂激進與保守都有著自身特別的意涵，所以在中國，「左」與「右」的劃分遠比西方國家來的複雜。

鑒於「左—右」這一面向劃分上存有的爭議性，一些學者也試圖從另外的維度來重新理解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比如，Wu（2014）通過實證研究指出，中國網絡上的意識形態既不是按照支持政府與否來劃分的，也不是按照通用的「左—右」來劃分的，而是沿著「文化自由主義」（cultural liberalism，在文化和政治上支持自由的價值觀）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主權和軍事主義傾向）的對立來劃

分的。他在研究中發現，「文化自由主義」為一邊，而「民族主義」、「政治保守主義」（political conservatism，反對西方的民主制，支持現行政體）和「經濟主權獨立」（economic sovereignty，國家在經濟決策時的獨立性，不受外來資本的控制）為緊密聯繫的另外一邊，以此為區分，構成了中國意識形態光譜的巨大分野。而對經濟上不平等的態度，比如減緩貧富差距、對農業進行補貼，這些傳統的西方式的「左—右」議題上的區分，並沒有與「文化自由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任何一邊有聯繫，也就是說在中國，無論是「文化自由主義」或者「民族主義」者，在減緩貧富差距、對農業進行補貼等問題上沒有太大分歧。

這說明，在中國貧富差距問題依然突出的當下，無論是何種意識形態的對立，都意識到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緊迫性。實際上，即使是在西方，「左」和「右」都追求平等，區別可能在於「左」派更強調平等的結果，而「右」派則是保護平等的機會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內在的不平等。在中國，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意識到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甚至中國的「右」派精英更加關心這一問題，他們希望政府能夠予以重視解決這些問題，只是在造成這一問題的成因上，「左」派認為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後果，而「右」派則認為是由於改革不徹底或財富被掌權者所壟斷所造成，因而更加積極主張推行改革開放，反對政府干預（馬得勇、王麗娜 2015；馬德勇、張曙霞 2014；樂媛、楊伯淑 2009）。

簡而言之，在中國，「左」與「右」的區分與西方，尤其是美國，還是存在著巨大差異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將中國的「左」「右」簡單地替換成美國的「右」「左」，只能說中國的「左」派與美國等國家的保守派或者「右」派在心理特性和看待世界的思維方式上更為相似，雖然他們都支持現有秩序，但顯然中國的「左」派支持的現有秩序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傳統文化，而西方的保守勢力或者「右」派支持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的傳統文化，所以當中國的「左」派遇上西方的「右」，對抗則會更加強烈（馬得勇、王麗娜 2015）。但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左」派與西方的「左」派仍有共通之處，畢竟共產主義思潮是西方社會的產物，後被中國所接受，才有中國所謂之「左」派。

之所以出現當下相對錯置的情況，乃是在於參照體系的變化，若中國政府本身為「左」，則反對政府自然成了「右」，但實際上，當今中國所謂的「右」派關注的卻有一些是明顯的「左」派議題，這也說明了中國在社會公平、貧富差距、社會保障等「左」派議題方面仍存有較大問題。馬德勇、張曙霞（2014）指出，中國的一些「右」派活躍人物還投身於底層的維權、環保等社會運動之中，而中國的「左」派精英卻很少與社會底層維權和抗爭運動走到一起。在對社會現狀的批評上，中

國的「右」派其實更像是西方的「左」派。不過據此推斷中國「右」派又與西方的「左」派相一致的話，則又顯得武斷。「右」派之所以為「右」還是在於對自由市場的主張、對於大政府的反對，以及對個人自由主義的追求。在心理根源上，中國的「右」派與美國的「右」派也是有著相通之處。

總之，意識形態作為一套觀念或者信仰的體系，雖然我們可以簡單歸為「左—右」兩級，但是其還是包含著多個面向的測量，在不同的國家或者不同的調查中，意識形態「左—右」所測量的面向和題項都是各不相同的（Rovny and Marks 2011）。意識形態的討論始終是一個非常複雜但又必須落入具體歷史社會情境中的討論。所以在不少的社會調查項目中，意識形態「左—右」傾向更多的是一種受訪者的自我報告，當然這也只能適用於在那些「左—右」對立平常且深入人心的社會中，比如以美國代表的西方社會。但是在中國，無論是意識形態「左—右」傾向的測量，還是其對環保態度的影響，都是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當然，即使我們能夠具有信度及效度地測量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左—右」傾向，但是其作用於中國居民環保態度的機制是否與西方一致仍是需要追問的。事實上，除了經典的「左—右」劃分，在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測量還有另外一個被經常使用的維度，那就是「威權主義—自由主義」（Authoritarian-Libertarian）的區分（Evans et al. 1996；Tilley 2005），對於採取「威權環保主義」策略的中國來說，這個維度的意識形態測量似乎更能反映中國環境治理的特殊情況。

一般而言，西方對於威權主義價值觀的定義是，相信社會必須維持的道德和文化標準的穩定，更願意接受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以及對於一個有凝聚力和安全感社會的追求；而自由主義價值觀則是認為，個體有權在道德層面做出自我的選擇，並且強調自我實現和自我表達，同時接受文化多元主義（Curtice and Bryson 2002）。在西方，威權主義或者威權人格更容易與保守右派相結合，但是馬德勇與王麗娜（2015）的研究指出，在中國，「左」派相較於「右」派而言，有著更強的威權人格特徵，對於現行體制更加維護和支持。所以，儘管「威權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上的區分並不會直接導致人們對於環保事務態度上的差異，但是在一個威權社會中，「威權主義—自由主義」的分歧依然會讓人更容易支持由威權中心所提倡的理念或者運動。保護環境、節約資源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在中國共產黨強大的領導和動員體制之下，理論上，具有威權主義價值觀的人勢必會遵循這一基本國策而具有更加友好的環保態度。

另外，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之下，黨員關係也會對意識形態取向有著顯著影響（Nathan and Shi 1996），一般而言，共產黨員相對於普通民衆來說，會更加擁護

現行的政治體制與執政理念，近年來，在中共中央以及中國各級政府都加大對環境保護投入力度的背景之下，共產黨員在中央的號召之下或許會「身先士卒」地採取環保行動。實際上，Xiao、Dunlap 和 Hong（2013）的研究證明，曾經提交過加入中國共產黨申請（不管成功與否）的居民，比起那些未曾提交過申請的人有著更加顯著的環境關心，一般而言，共產黨員都站在支持官方的立場之上，因而，就本研究所討論的議題而言，黨員關係也將是理解中國居民環保態度的一個重要變量。

綜上所述，意識形態對於中國居民環保態度的影響將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但是目前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實在是太少了。但是正如 Jost、Federico 和 Napier（2009）；Leinaweaver 和 Thomson（2016）；Nathan 和 Shi（1996）等學者所指出的，意識形態「左—右」最重要的分野還是因為對於國家或者政府在社會與經濟運行中起的作用的看法差異而導致的，我們可以從居民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中去比較他們環保態度的差異。另外，「威權主義—自由主義」上的分歧以及「黨員關係」或許將成為理解中國式環境政治的重要預測變量。

參、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採用的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簡稱：CGSS）2010 年的數據，該調查系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持，並聯合國內其他學術單位共同實施。本次研究採用多階分層概率抽樣設計，其調查範圍覆蓋了中國大陸全部 31 個省級行政單位（不包含港澳臺地區）。在 CGSS2010 的問卷中，環境模塊為選答模塊，所有受訪者通過隨機數均有三分之一的概率回答此模塊，因此樣本也具有代表性。CGSS2010 的最終有效樣本數為 11783 個，其中環境模塊的樣本量為 3672 個。CGSS2010 的環境模塊的絕大多數問卷內容與國際社會調查項目 ISSP2010 年的環境專項調查內容是一致的，這也讓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環境事務有了可比較性。

二、變量測量

本研究涉及的變量分為三類：控制變量，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①

(一) 控制變量

依照過往關於環境態度的研究，大多數的研究者都習慣將性別、年齡、家庭年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等人口學變量納入考察之中（Liere and Dunlap 1980）。對於中國居民環境態度的研究也不例外，Xiao 和 Hong（2010；2012）特別考察了性別對於中國居民的環境關心和環保行爲的影響，結果顯示，中國都市地區的男性要比女性有著更多的環境關心，而女性卻有著更多家庭內部的環保行爲（如資源回收）等。Xiao、Dunlap 和 Hong（2013）則是指出，教育程度高者、男性、公務員、大城市的中國居民有著更多的環境關心。洪大用等人（2015）就中國公眾的環境關心的年齡差異進行了考察，結論顯示，青年人整體上比老年人更具環境關心，且突出體現為 1970 年代前後出生的兩代人之間的差別。基於以上，本研究決定將性別、年齡、家庭年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等人口學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本研究中，對原來以分類變量進行測量的教育程度以受教育年限進行了重新編碼，「未受過正式教育」、「小學／私塾」、「初中」、「高中／中專／職高／技校」、「大專」、「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別被賦值為 0、6、9、12、15、16、19。家庭年收入以千元人民幣為單位進行了替換。年齡這一變量在原始測量中是詢問出生年月日獲得的數據，本研究用訪談年減去出生年得到新的年齡變量，其中最晚出生的受訪者為 1993 年，因而年齡的最小值為 $2010-1993=17$ 歲。性別、年齡、家庭年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的樣本缺失值取樣本均值進行替換，其中性別這一變量並無缺失值。

此外，國外不少研究指出，除了以上這些人口學變量之外，個人對於環境事務的理解能力，即個人對於環境問題的成因以及解決辦法的瞭解程度，也會影響到也

註① 被解釋變量即環境態度的測量大多是在環境模塊中，因為環境模塊中的部分問題採用的是與 ISSP（2010）一致的問題與答題選項，而 ISSP（2010）的問卷中的部分問題有「無法選擇」這一答題選項，因而此環境模塊在中國的測量中，有大量的「無法選擇」這一答題選項被勾選，其中被勾選最多的一題出現在「在保護世界環境方面，一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做的多。總體來說，您認為中國做的如何？」這一問題中，有 873 位受訪者勾選了「無法選擇」，約占總數的 23.8%，環境模塊中的其他問題的「無法選擇」被勾選次數最少為 52 個，約占總數的 1.4%。本研究將「無法選擇」視為缺失值，但並未將此選項做刪除處理，而是根據各個變量的測量類型等，對「無法選擇」缺失值以及系統缺失值做了不同的處理，具體處理辦法見正文中的變量測量介紹。

會影響到他們對於環境事務的看法（McCright and Dunlap 2011；McCright, Dunlap, and Marquart-Pyatt 2016），也就說當一個人對於環境事務理解得越多，他越有可能採取積極的環保態度。本文將「環境事務理解力」也列入控制變量中。

具體到本研究而言，環境理解力的測量由兩個題項組成，一個是「您對造成上述各種環境問題的原因有多少瞭解？」，另一個是「您對解決上述各種環境問題的辦法有多少瞭解？」，答案從「根本不瞭解」到「非常瞭解」分成 5 個等級，得分越高表示更加理解，我們將這兩道題目的得分相加並取均值，合併為一個新的變量「環境事務理解力」，此項得分越高者表示有著更高的「環境事務理解力」。這兩道題目的缺失值取中間選項「說不上瞭解不瞭解」的值進行處理。

（二）解釋變量

本研究的解釋變量集中在對於意識形態的測量上。但是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並沒有對意識形態的「左—右」傾向進行直接測量，我們只能用受訪者對於國家或者政府在社會與經濟運行中起的作用的看法來間接反映他們的「左—右」傾向。一般而言，意識形態「右傾」的人會比較偏向於自由市場，即認為私營企業而不是國家管控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最好出路，這一點中國的「右」派與美國的「右／保守」派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就「對政府進行資源再分配的看法」而言，美國的「保守」派似乎並不太主張政府動用權力進行資源的再分配，比如提高對富人的稅收來救濟窮人，但是因為中國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問題，中國的「右」派也在督促政府部門採取措施來解決貧富問題，所以中國的「右」派在現階段並不必然地反對政府進行資源再分配，這也是為何本研究沒有將這兩個題項簡單疊加而形成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左—右」變量的原因，而是直接用「對自由市場的偏好」以及「對政府進行資源再分配的看法」這兩個變量。

在前文中我們也提到，美國及西方的「右」派沒有那麼熱衷於環保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普遍相信，環保會影響到經濟增長並形成了市場干預，這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因而，用「對自由市場的偏好」以及「對政府進行資源再分配的看法」這兩個變量實際上也能夠對中國和西方是否具有同樣的環保態度動因進行比較。實際上這兩個變量也經常出現在利用 ISSP 調查數據進行的環保態度或者環境關心的研究中（Fairbrother 2016；Tranter and Booth 2015），並且一般而言「對自由市場的偏好」人較不關心環境，而支持政府應當「進行資源再分配」的人則有著更高的環境關心。

這兩個變量的具體測量為：「私營企業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最好途徑」以及「縮小貧富差距是政府的責任」，答案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為 5 個

等級，得分越高表示越支持「自由市場」和「資源再分配」。兩道題目的缺失值取中間選項「無所謂同意不同意」的值進行處理。

而回到中國的特殊國情中，鑒於中國的一黨執政的現狀，我們相信「威權主義—自由主義」的區分是理解中國意識形態光譜的一個重要面向，因此我們將這個變量納入到模型的解釋變量之中。在本研究中，這個變量的測量由三個題項組成，分別為：「如果有人公共場所發布批評政府的言論，政府不應該干涉。您同意嗎？」；「生多少孩子是個人的事，政府不應該干涉。您同意嗎？」；「在哪裡工作和生活是個人的自由，政府不應該干涉。您同意嗎？」，答案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為 5 個等級，我們將這三道題目得分相加並取均值，合併成爲一個新的變量「自由主義」。每道題目的缺失值取中間選項「無所謂同意不同意」進行替換。此項得分越高，表示受訪者有著更強的「自由主義」立場，因爲在中國，輿論管控、計劃生育政策以及戶籍制度，都涉及到社會的穩定，一定程度上這些政策也限制著人們的言論、生育和遷徙的自由。

此外，本研究將「黨員關係」做「黨員 / 非黨員」的二分處理。

（三）被解釋變量

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是人們的環保態度，盧春天與洪大用（2011）指出，環境態度在相當程度上等同於環境關心，在相關文獻中，這兩個概念也通常被交替使用。對於環境關心或者環境態度的測量有兩種取向，一種是政策取向，主要關注公眾對於環境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其所作的測量主要圍繞人們對政策或者環境問題的看法；第二種取向是理論取向，主要是運用社會心理學中的態度理論，側重對「關心」部分的情感、認知、意動等維度進行測量。

具體到本研究而言，我們從四個面向對這個變量進行測量，即環保態度可以分爲「環境關心與環境問題嚴重性感知」、「環保支出意願」、「政府環保效能評價」、「環保行爲」四個部分。

其中「環境關心」的測量爲「總體上說，您對環境問題有多關注？」，得分越高表示越關心。「環境問題嚴重性感知」的測量爲：「根據您自己的判斷，整體上看，您覺得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是否嚴重？」，得分越高表示認爲環境汙染問題越不嚴重。爲了便於直觀理解，本研究將「環境問題嚴重性感知」進行反向編碼，即得分越高者表示認爲環境汙染問題越嚴重。兩道題目的缺失值取中間選項的值進行處理。

「環保支出意願」由三個題項組成，分別爲：「爲了保護環境，您在多大程度

上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爲了保護環境，您在多大程度上繳納更高的稅？」以及「降低生活水平？」得分越高表示越不願意進行環保支出，同樣地，本研究也將「環保支出意願」的三個項目進行反向編碼，得分越高者表示越願意進行環保支出。這三個項目的缺失值取中間選項「既非願意也不願意」的值進行替換。

「政府環保效能評價」也由三個題目組成，通過對這一問題的測量，可以看出意識形態有無影響到對政府環保事務治理的評價上，對於將來的政策執行能夠起到一定的信心預測。這三個題目分別爲：「在保護世界環境方面，一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做的多。總體來說，您認爲中國做的如何？」答案依次爲：「做得太好」、「做得正好」和「做得太少」，得分越高表示越不滿意中國在保護世界環境上的表現。本研究將本題做了反向編碼，得分越高表示對中國在世界環境保護中的作爲表示越滿意，本道題目的缺失值取樣本的均值進行替換。

另外兩道有關「政府環保效能評價」的測量是請受訪者回答「在解決中國國內環境問題方面，您認爲近五年來，中央政府做得怎麼樣？」以及「在解決您所在地區環境問題方面，您認爲近五年來，地方政府做得怎麼樣？」，得分越高表示越加肯定政府的環保工作表現。這兩道題目的缺失值取樣本的均值進行替換。

最後是關於「環保行爲」的測量，採用的辦法是分別向受訪者提問有無採取下列行爲去保護環境，依次爲：「減少居家的油、氣、電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環境保護而節約用水或對水進行再利用」以及「爲了環境保護而不去購買某些產品」，這三個題目的答案依次分爲「總是」、「經常」、「有時」、「從不」四個選項，得分越高表示越不採取實際的環保行爲。本研究對「環保行爲」的三個子項進行了重新編碼，得分越高表示有著更多實際的環保行爲。這三道題目的缺失值將採取樣本的均值進行替換。

本研究所有變量的編碼表、平均數以及標準差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研究中各變量的編碼、平均數以及標準差

變量名稱	編碼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1.53	0.5
年齡	17-91 (歲)	47.31	15.73
教育程度	0-19 (受教育年限)	8.94	4.59
家庭收入	0-3000 (千元人民幣)	42.9	95.44
環境理解力	1 (根本不瞭解) -5 (非常瞭解)	2.54	0.93
自由主義	1 (完全不同意) -5 (完全同意)	2.91	0.82

變量名稱	編碼	平均數	標準差
黨員關係	0 (非黨員) -1 (黨員)	0.13	0.34
自由市場	1 (完全不同意) -5 (完全同意)	3.09	0.98
資源再分配	1 (完全不同意) -5 (完全同意)	3.9	1.03
環境關心	1 (完全不關心) -5 (非常關心)	3.66	0.98
環境問題嚴重性感知	1 (根本不嚴重) -5 (非常嚴重)	3.78	0.93
支付更高價格	1 (非常不願意) -5 (非常願意)	3.14	1.08
繳納更高的稅	1 (非常不願意) -5 (非常願意)	2.94	1.06
降低生活水平	1 (非常不願意) -5 (非常願意)	2.82	1.09
政府保護世界環境	1 (做的太少) -3 (做的太多)	1.55	0.55
中央政府表現	1 (忽視了環保) -5 (取得很大成績)	3.19	1.02
地方政府表現	1 (忽視了環保) -5 (取得很大成績)	2.74	1.07
減少居家能源消耗	1 (從不) -4 (總是)	2.16	0.93
節約用水	1 (從不) -4 (總是)	2.49	0.97
環保消費	1 (從不) -4 (總是)	1.98	0.8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本研究使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對變量之間的關係進行探究，並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作為擬合方法對多元回歸方程的係數進行估計。本研究共有 11 個因變量，因而共有 11 個回歸模型，並且這 11 個模型基本都滿足使用多元回歸分析的基本假設。

此外，考慮到「自由主義」、「黨員關係」、「自由市場」偏好以及「政府資源再分配」這四個解釋變量之間可能會存在共線性關係而影響到最終的結果呈現及分析，本研究特別地對這四個解釋變量的相關性做了考察，Pearson 相關係數矩陣顯示各自變量之間的相關係數皆較小。在共線性診斷方面，11 個模型的 VIF 值皆小於 2，可視為是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因而可以利用回歸結果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肆、結果

表 2 顯示了意識形態對中國居民環保態度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

我們可以發現，總體而言，「自由主義」、環境理解力與教育程度對中國居民的環保態度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中，除了環境問題嚴重性的感知之外，「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於環保態度的其他面向均產生了顯著影響。而環境理解力除了在主觀層面的對於政府環保工作的評價上沒有產生影響之外，對於環境關心、環境問題嚴重性感知、環保支出意願以及具體的環保行為都產生了影響，這說明對於環境問題的成因和解決辦法瞭解的越多，對於環境保護的態度也是積極正向的，也樂於和更加積極地採取環保行為。教育程度這一變量也是如此，即在中國，教育程度越高者，環境關心、環保支出意願以及環保行為就越多，但是對中國政府在環保世界環境中的作為以及中央政府的環保工作表現出了更多的不滿意。

當然，本文所關切的是意識形態對於環境態度的影響。我們發現，整體而言，「自由主義—威權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光譜除了對於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感知不顯著之外，對環保態度的其他所有變量都產生了影響，即在中國反對威權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有著較少的環境關心，較低的環保支出意願以及較少的環保行為，「越自由越不環保」呈現出來了一致性。而且「自由主義者」對於政府的環保工作評價卻是無一例外的「差評」，即「自由主義」程度越高的人，越不滿意政府的環保工作。

而此前我們認為會對中國居民環保態度產生影響的另一個變量「黨員關係」，在環保態度上基本上出現了與「自由主義」相反的局面，這也說明了「黨員身分」與「威權主義」的認同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繫。不過「黨員關係」僅對環境關心和支付更高價格以及繳納更高的稅產生積極正向的顯著影響，這也印證了中國的「威權環保主義」的治理取徑，中共黨員的確有著更多的環境關心與環境支出意願，畢竟在中國，所有人都認為黨員能夠有著更加與中央保持一致的態度主張。但是黨員身分對於具體的環保行為來說，卻沒有顯著的影響，這或許可以理解為黨員只是具有較高的「環保姿態」，但是在實際行為上與非黨員卻沒有顯著差異。

被我們視為與「左—右」意識形態測量相關的「自由市場」偏好與「政府資源再分配」偏好的兩個變量對於具體的環保行為來說是有著顯著影響的，並且兩者的影響是相反的。也就是說，在中國，越偏好「自由市場」，即意識形態偏右的人，在環保行為上越消極。而與之相反，支持「縮小貧富差距是政府責任」這樣論述的

表 2 意識形態對中國居民環保態度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

	環境關心	環境問題嚴重性感知	支付更高價格	繳納高的稅	降低生活水平	政府保護世界環境	中央政府表現	地方政府表現	減少居家能源消耗	節約用水	環保消費
自由主義	-.064 ***	.014	-.082 ***	-.076 ***	-.059 ***	-.123 ***	-.104 ***	-.098 ***	-.047 **	-.060 ***	-.053 **
黨員關係	.047 **	.013	.047 **	.058 **	.026	-.039 *	.030	.038 *	-.009	.014	.013
自由市場	.020	-.017	.026	.016	.015	.028	.032 *	.020	-.049 **	-.042 **	-.031 *
資源再分配	.031 *	.067 ***	-.016	-.035 *	-.045 **	-.022	-.016	-.034 *	.058 ***	.054 **	.055 ***
性別	.003	.031	.021	-.008	-.002	-.068 ***	-.065 ***	.000	.036 *	.056 **	.052 **
年齡	.001	-.066 ***	.004	.024	-.014	.040 *	.037 *	.054 **	.081 ***	.126 ***	.076 ***
教育程度	.148 ***	.185 ***	.098 ***	.031	-.010	-.166 ***	-.167 ***	-.038	.174 ***	.187 ***	.248 ***
家庭收入	-.003	.017	.019	.009	.023	-.013	-.030	.022	.005	.026	.039 *
環境理解力	.248 ***	.172 ***	.180 ***	.170 ***	.169 ***	-.022	-.003	-.023	.173 ***	.135 ***	.181 ***
調整後的 R ²	.118	.109	.064	.046	.035	.064	.053	.019	.075	.071	.120

說明：1. 表中數字為標準化係數的值；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人，在環保行為上卻表現出了積極參與的一面，但是卻表現出來的較低的環保支出意願。這有可能是因為支持「縮小貧富差距是政府責任」這一論述的人的經濟地位並不是很高，他們在積極參與著環保行為，但是卻沒有能力去為了環保而產生更多的經濟上的支出。

通過表 2 我們可以看到，總體而言，在中國，意識形態對於居民環保態度的影響是有著顯著差異的，並且「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這兩種意識形態對居民的環保態度的影響具有一致性，即產生消極的影響；而更多支持「威權主義」的黨員以及認可「政府資源再分配」的人，有著更加積極的環保態度。這也初步說明了意識形態對於中國居民的環保事務產生影響，但是其發生作用的機制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伍、討論與結論

我們從美國的「越左越環保」這一研究結論是否具有普適性出發，探討此前很少有人討論到的意識形態對於中國居民環保態度的影響這一話題，結果我們發現，意識形態的分野在中國的確會造成環保態度上的差異。並且基本上與美國的發現一致，在中國偏好「自由市場」的人有著更少的環保參與行為，而支持「政府資源再分配」的人有著更多的環境友善行為，並且有著更強烈的「環境嚴重性」感知。這說明了環境事務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會涉及到民衆對於政府所應該扮演角色的認知，以及涉及到社會資源再分配這一話題，因而環保事務不可避免地要成爲一個意識形態「左—右」的問題，並且「越左越環保」。這也印證了環境社會學者 Dunlap（1975）的看法：環保問題不可避免地要成爲一個政治問題。在代議制的西方社會中，政黨總要代表特定意識形態傾向的選民意見，進而影響到因環保事務所帶來的資源再分配過程中的利益爭鬥。

但是這種解釋機制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的特殊情況，即在中國，偏好「自由市場」的人這樣「右派」傾向的人更多的是在環保行為上比支持「政府資源再分配」這樣「左派」傾向的人來得消極。但是，當我們從「威權主義—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出發時，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影響在整體上表現出了一致性，即「自由主義」的立場越強，包括環境行為在內的整個環保態度越消極。這或許可以視爲是另一種「消極抗議」。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總體上對環保是一種消極的態度，但是明白其內在機制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消極態

度可能更多是對「威權環保主義」的質疑，因而，他們反對為了環保而支付更高的價格，繳納更高的稅與降低生活水平。實際上，一些中國的「自由主義」精英，也在積極地推動政府正視環境危機，促進中國環境質量的改善。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反對環保本身，他們反對的是這種政府在環保政策制定時的「非公眾參與式」的環保策略，比如重汙染天用行政手段強令企業限產或關停等。雖然「威權環保主義」能夠在環境治理上能夠帶來某些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政府主導的環境保護很難讓公民得到環境知情權的滿足，並由此增進環保意識，公民往往處於一種相對被動的執行角色，因此戴佳與曾繁旭（2016, 98）建議，中國的環境政治需要從威權主義走向環境民主轉型，克服政府權力與社會權力嚴重失衡的狀態，並為公民個人的環境權利保護、環境治理參與提供制度保障。畢竟一個環保型社會的到來，離不開公民作為主人翁的積極參與。所以，當中國真正從環境威權主義轉型至環境民主主義的話，「威權主義—自由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對立的對於環保態度的影響或許也會慢慢消失。

最後，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那就是：意識形態的確會對環保態度產生影響，但是在不同的國家，意識形態起作用的機制是不一樣的。「左—右」的對立在一黨執政的國家裡可能不是影響人們環保態度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分歧，「威權主義—自由主義」反而是最能夠影響人們環保態度意識形態光譜。另外，我們發現意識形態之外的環境理解力對於環保行為有著非常積極的影響，這也提醒我們，政府可以加強對於環保問題成因和解決辦法的宣導，以促進人們更多的採取環境友善行為。

當然本文也存在著很多局限之處，就相關變量的測量而言仍有許多不盡完善的地方。比如，由於使用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沒有直接測量意識形態「左—右」的對立的題項，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使用「自由市場」偏好以及是否支持「政府進行資源再分配」兩個指標來反映出意識形態「左—右」的對立；其次，「威權主義—自由主義」測量僅是通過三個題項，未來如果有著更加有信度和效度的意識形態光譜的測量將非常有利於這個問題的繼續探索。

* * *

Political Id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China

Sheng-Quan Xu

PhD Candidate

PhD Program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political ideolog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ople'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the U.S., leftists/liberals have more environmental concern than rightists/conservatives. However, researchers paid only scant attention on how political ideology affect Chinese people'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s a one-party state, the political ideology divergence on “left-right” i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what is in America and what means “left” in such two countries are not the same. Thus, it becomes complex to examine how the political ideology affects China's citizen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Employing data from CGSS2010, the research examined the political ideology divide and their effects on people'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China. Due to the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in China, results documented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political ideology divide i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but the ideological division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China is primarily split between authoritarian and libertarian. The left-right ideology divides contributes just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However, the stronger the position of “liberalism,” the more negative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titude. Since environmental affairs is related to the re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when the government takes “authoritative” means to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i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opposition from “liberals.” There is a conclusion that ideology does have an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but it has different mechanis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Keywords: Political Ideology,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China, Environmental Politics

參考文獻

- 洪大用、范業超、鄧霞秋、曲天詞，2015，〈中國公眾環境關心的年齡差異分析〉，
《青年研究》，1：1-10、94。Hong, Da-yong, Ye-chao Fan, Qiu-xia Deng, and Tian-
ci Qu. 2015. “Zhongguo gongzhong huanjing guanxin de nianlin chayi fenxi” [Are Youths
More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Age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hina]. *Youth Studies*, 1: 1-10, 94.
- 馬得勇、王麗娜，2015，〈中國網民的意識形態立場及其形成：一個實證的分析〉，
《社會》，35（5）：142-167。Ma, De-yong, and Li-na Wang. 2015. “Zhongguo
wangmin de yishi xingtai lichang jiqi xingcheng: yigeshizheng de fenxi” [Chinese
Netizen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ir Sourc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5(5): 142-167.
- 馬德勇、張曙霞，2014，〈中國網民的「左」和「右」〉，《二十一世紀》142：86-
103。Ma, De-yong, Zhang, Shu-xia. 2014. “Zhongguowangmin dezuo he you” [“The
Left” and “the Right” among Chinese Netizens]. *Twenty-First Century*, 142: 86-103.
- 樂媛、楊伯濂，2009，〈中國網民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派別〉，《二十一世紀》112：22-
34。Le Yuan, and Bo-xu Yang. 2009. “Zhongguo wangmin de yishi xingtai yu zhengzhi
paibi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actions of China's Internet Users]. *Twenty-First
Century*, 112: 22-34.
- 盧春天、洪大用，2011，〈建構環境關心的測量模型：基於2003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數據〉，《社會》，31（1）：35-52。Lu Chun-tian, and Da-yong Hong. “Jiangou
huanjing guanxin de celiang moxing” [Constructing a Model for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Concern: Based on the 2003 CGSS Dataset].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1): 35-52.
- 戴佳、曾繁旭，2016，《環境傳播：議題、風險與行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Dai,
Jia, and Fan-xu Zeng. 2016. *Huanjing chuanbo: yiti, fengxian yu xingdong*.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ssues, Risk and Actio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 簡旭伸，2016，〈威權環境主義流域治理之機制與限制：以中國昆明河長制度為例〉，
《中國大陸研究》，59（4）：1-23。Chien, Shih-Shen. 2016. “Weiquan huanjing
zhuyi liuyu zhili zhi jizhi yu xianzhi: yi zhongguo Kunming hezhang zhidu weili”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and River Leader System in Kunming, Chin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9 (4): 1-23.
- Brown, Kerry. 2012.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deolog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0 (2): 52-68.

- Buttel, Frederick M, and William L Flinn. 1978.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The Impacts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Ideology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0 (1): 17-36.
- Curtice, John, and Caroline Bryson. 2002.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political orientations." http://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docs/methodology/core_ess_questionnaire/ESS_core_questionnaire_socio_political_orientations.pdf. (January 29, 2018).
- Dunlap, Riley E, Chenyang Xiao, and Aaron M McCright. 2001.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America: Partisan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s in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ism."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0 (4): 23-48.
- Dunlap, Riley E. 1975.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Action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7 (4): 428-454.
- Eckhardt, William. 1991.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12 (1): 97-124.
- Erikson, Robert S, and Kent L Tedin. 2014.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Its Origins, Content and Impact*. New York: Routledge.
- Evans, Geoffrey, Heath, Anthony, Lalljee, and Mansur. 1996. "Measuring Left-Right and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Values in the British Electorat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7 (1): 93-112.
- Fairbrother, Malcolm. 2016. "Trust and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Diverse National Contexts." *Sociological Science*, 3: 359-382.
- Fankhauser, Sam, Caterina Gennaioli, and Murray Collins.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ssing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35: 52-61.
- Federico, Christopher M. 2007. "Expertise, Evaluative Motiv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Citizens' Ideological Commit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28 (5): 535-561.
- Feinberg, Matthew, and Robb Willer. 2013. "The Moral Root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1): 56-62.
- Fielding, Kelly S, Brian W Head, Warren Laffan, Mark Western, and Ove Hoegh-Guldberg. 2012. "Australian politicians' beliefs about climate change: political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ideolog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1 (5): 712-733.
- Gilley, Bruce. 2012.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and China'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1 (2): 287-307.

- Gromet, Dena M., Howard Kunreuther, and Richard P. Larrick. 2013. "Political Ideology Affects Energy-efficiency Attitudes and Choi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23): 9314-9319.
- Harring, Niklas, and Jacob Sohlberg. 2017. "The Varying Effects of Left-right Ideology on Support for the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a Swedish Survey Experiment."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6 (2): 278-300.
- Jagers, Sverker C, NiklasHarring, and Simon Matti. 2018.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rom Left to Right: on Ideology, Policy-specific Beliefs and Pro-environmental Policy Suppor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61 (1): 86-104.
- Jost, John T, Christopher M Federico, and Jaime L Napier. 2009. "Political Ideology: Its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Elective Affinit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 307-337.
- Kim, Seoyong, and Sungwook Kim. 2010.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hree East Asia Countries: Korea, Japan,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5 (1): 17-33.
- Lau, Raymond WK. 1999. "Left and Right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1990s and the Façade of the 'Third Thought Liber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12 (1): 79-102.
- Leinaweaver, Justin, and Robert Thomson. 2016. "Greener Governments: Partisan Ideologies, Executive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5 (4): 633-660.
- Li, Jun-Peng. 2017. *The Making of Liberal Intellectual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 Liere, Kent D Van, and Riley E Dunlap. 1980. "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 Review of Hypotheses, 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4 (2): 181-197.
- McCright, Aaron M, and Riley E Dunlap. 2011. "The Politic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s Views of Global Warming, 2001~2010."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2 (2): 155-194.
- McCright, Aaron M, Riley E Dunlap, and Sandra T Marquart-Pyatt. 2016. "Political Ideology and Views about Climat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5 (2): 338-358.
- Nathan, Andrew J, and Tianjian Shi. 1996. "Left and R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Alignments in Deng Xiaoping's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4): 522-550.

- Nawrotzki, Raphael J. 2012.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5 (3): 286-307.
- Pan, Jennifer, and Yiqing Xu. 2018.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0 (1): 254-273.
- Pilbeam, Bruce. 2003. "Natural Allies? Map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rvatism and Environmentalism." *Political Studies*, 51 (3): 490-508.
- Rovny, Jan, and Gary Marks. 2011. "Issues and Dimensions in Public Opin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Sherman, Amanda K, Alexandra J Rowe, Stephen Bird, Sue Powers, and Lisa Legault. 2016.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Explains the Link between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copsychology*, 8 (4): 239-249.
- The Guardian. 2016. "Climate Change a Chinese Hoax? Beijing Gives Donald Trump a Lesson in Histo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nov/17/climate-change-a-chinese-plot-beijing-gives-donald-trump-a-history-lesson>. (January 29, 2018).
- Tilley, James R. 2005. "Research Note: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Value Change in Britain, 1974-2001." *Political Studies*, 53 (2): 442-453.
- Tranter, Bruce, and Kate Booth. 2015. "Scepticism in a Changing Climate: A Cross-national Stud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33: 154-164.
- Wu, Angela Xiao. 2014.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ver a China-as-Superpower Mind-set: An Exploratory Charting of Belief Systems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2008-20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2243-2272.
- Xiao, Chenyang, and Dayong Hong. 2010.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China." *Population & Environment*, 32 (1): 88-104.
- Xiao, Chenyang, and Dayong Hong. 2012. "Gender and Concern for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Urban China."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5 (5): 468-482.
- Xiao, Chenyang, Riley E. Dunlap, and Dayong Hong. 2013. "The Nature and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mong Chinese Citizen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4 (3): 672-690.
- Yang, Guobin, and Craig Calhoun. 2007.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1 (2): 211-236.